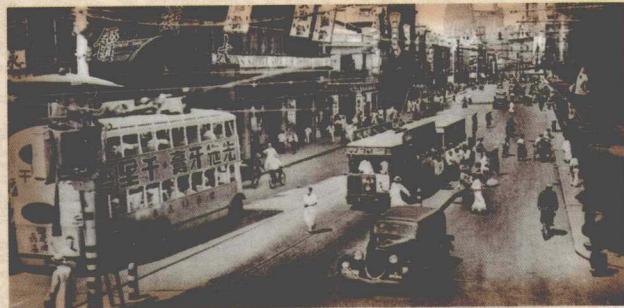


SHEHUI SHIYE XIA DE
JINDAI SHANGHAI

邵 雍 等著

社会史视野下的
近代上海



学林出版社

SHEHUI SHIYE XIA DE
JINDAI SHANGHAI

邵 雍 等著

社会史视野下的
近代上海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 / 邵雍等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86-0525-6

I . ①社… II . ①邵… III . ①社会发展史 - 上海市 - 近
代 IV .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535 号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

著 者——邵 雍 等著



责任编辑——解永健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www.ewen.cc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26

字 数——45 万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525-6/K·47

定 价——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马长林

邵雍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知道他做学问非常勤奋，成果很多，心中一直甚为敬重。这次能先拜读他的新作，殊感荣幸。我在上海史研究方面长期来甚有兴趣，一直感到同行中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以往读到的有关上海史著作，专题性个人独著较多，眼前的这本书，是邵雍和他的一批学生以及其他学者所著，用了一个别致的书名：《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其中的文章，多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上海史。

社会史是当前史学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学科。国内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昙花一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盛行的农民起义、政权更替等传统研究的局限，研究范围宽广，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目，故有学者认为：“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1]确实，社会史研究的方兴未艾，为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了面目一新的气象，众多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出现，为人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一些对上海史感兴趣的海外学者，在社会史研究方面本来是走在我前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从欧美、日本到上海来作访问的学者和研究生，她们的研究课题多属于社会史范畴，如美国学者韩起澜进行的上海纱厂女工、苏北人在上海的研究，美国学者顾德曼进行的上海同乡组织会馆、公所的研究，日本学者小浜正子进行的上

[1] 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海慈善机构的研究,美国学者贺萧进行的有关20世纪上海娼妓研究,等等。当时我等之辈孤陋寡闻,对世界史学界的研究流行和趋向了解不多,故对这些外国学者为什么不选择重大题目,反而喜欢选择此类涉及社会底层或民间社团的题目作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很理解,后来才知道,她们正是受年鉴学派影响,以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开展上海史研究的,在这方面,她们可说是先行者。

其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国内史学界一批学者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已经起步,邵雍教授即是其中之一。据我所知,邵雍教授很早就开始涉足党史方面的研究,这当然与他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国内会党史研究的一个重镇有关。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因此硕果累累。他是国内学界对帮会组织、会党群体等社会下层民众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其著作《中国帮会史》(下编)、《中国会道门》、《民国绿林史》、《中国近代会党史》、《中国近代土匪史》等,涉及近代社会底层的主要群体,资料翔实,阐述系统,观点鲜明,颇为学界所推崇。近年来他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妓女、妇女等题材也有所涉及,其所著《中国近代妓女史》、《中国近代妇女史》即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是上海史研究领域一个重要阵地的有利条件,邵雍教授也将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上海史研究,其研究视野独特,研究成果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觉,本书即是多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汇集。

从本书各篇文章所反映的内容,可以看出,按照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上海史研究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如《〈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从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广告中看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通过对媒体评论和广告的梳理和分析,反映和揭示了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像《近代上海的茶馆》、《上海女工与近代上海社会》、《近代上海中医的日常生活》、《上海平民住宅区的居民日常生活透视》、《近代上海的业余运动员与观众》、《民国时期沪上戏曲艺人的社会交往》、《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难民救助》等文章,着眼于平民的日常生活、业余爱好等,以此描述和反映近代上海历史进程中社会多个层面的生活状态及其特点。这些研究,小题大做,使我们对于上海历史上民众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层次、更多方面的了解,上海历史的镜像,由此得以更加丰富和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感谢邵雍为推进上海史研究所做的这些探索。

上海史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改革开放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包括前不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推出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展现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细节,至今有关研究仍在向纵深发展。从社会史视野对上海史作考察,近年来陆续有一些成果面世,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待开垦的领域还很多,有许多题目值得我们“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所以我衷心地希望,邵雍和他的团队能有更多的成果贡献于世,同时也热忱地期待:能有更多的年轻研究人员,从这本著作中得到启发,为从社会史视野观察上海史,作出更多的探索和研究,使上海历史的还原和阐述,更加精彩纷呈。当然,我也相信,对于喜欢了解上海的读者来说,此书无疑是更加全面地了解上海的一本佳作,值得一读。

目录

序	1
---------	---

媒体与都市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2
《点石斋画报》中的十里洋场	16
《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	24
从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广告中看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	34
申报馆出版物的时代特点	46

晚清以来的社会问题

万国禁烟大会前的上海禁烟斗争	52
20世纪初期青帮在上海郊县的活动	70
晚清上海乞丐初探	73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禁止彩票运动	82
上海地区一贯道研究	91

市民生活与抗争

近代上海的茶馆	112
上海女工与近代上海社会	122
上海女性群体的构成状况分析(1927—1937)	139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47

刘湛恩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157
广东大埔旅沪同乡会	166
近代上海中医的日常生活	181
上海平民住宅区的居民日常生活透视	199

教育、体育、曲艺

学校及社团四题	210
从《申报》的舆论看上海的教育(1919—1927)	217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精武体育会	227
近代上海的业余运动员与观众	236
民国时期沪上戏曲艺人的社会交往	269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滑稽	28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舞女	289

社会网络与社会管控

李绍熙游民集团和上海小刀会起义	300
青帮头目应夔丞	304
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	310
清末民初上海社会转型中同乡组织的介入	319
王一亭与近代上海慈善事业	323
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的社会功能	332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难民救助	351
上海游民习勤所的关系网络	378
上海市立儿童教养所的关系网络	383
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童子军	396

参考书目	402
后记	405

媒体与都市

花記時政集

明定劍花記

續

暫停

數

天

七八朝女報已出 寄信

十五各國和約

公報

廣告

書

錄

卷

五

大

英

海

上

界

南

英

美

法

德

意

西

日

俄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波

羅

匈

希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邵 雍

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说：“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1]根据笔者的体会，上海与纽约至少有以下几个相同点：

富有，都是当时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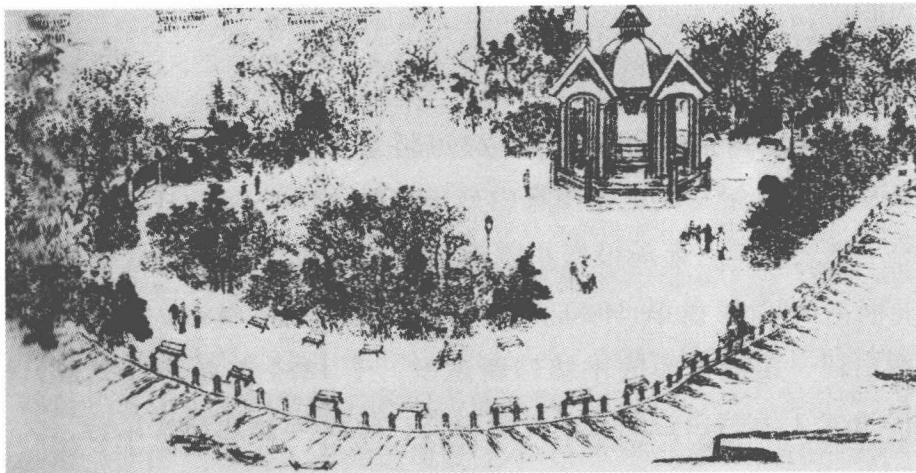
宽容，表现为多元化，人口集中，种族混杂，海纳百川。

创造精神，给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机会。

这些在《纽约时报》的各种报道中均有所反映。感谢郑曦原，他在修订《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新版本时有意增加的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及1908年五组报道上海的电稿，使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有了新的历史体认。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依据这些电稿，阐释《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标志。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外滩为城市化的扩展源不断向周边地区延伸和推进。在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的19世纪中期，于1851年创刊的《纽约时报》怀着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东方世界探索发展商业的动机，开始了对上海的追踪报道。在大洋彼岸即时记录了上海前进的步伐，给上海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868年上海外滩公园

1. 城市化进程一般首先表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和集中,以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加。正如纽约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都市,“移民的涌入仍无减缓的迹象”^[1]一样,上海的人口在经历了最初十年人口缓慢增长的阶段后,以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攻打上海为契机,进入了突发增长快车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1886年夏上海“租界内,约居住有4000名洋人和将近20万清国人。上海旧城的城墙与租界相邻,那里面居住着50万清国人。租界囊括了临河大约4英里的土地”。^[2]同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说:“大约有400名美国人居住在上海”。^[3]“就像所有临近河流的城市一样,这里还有好多随江漂流的船上人家。上海旧城外,通常停泊着上千艘平底帆船,它们大部分是货船。在那一带,还挤着成千上万条小木船,这就是江上人家唯一的居所了”。^[4]

2. 城市化进程又表现在地域景观方面,也就是城市在地域范围方面的扩大。就上海而言,是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过程。187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首次向美国公众隆重推出上海外滩,文章说:“临江的那条街道名为‘外滩’。外滩上,有一排宏伟的西式建筑,有些楼房修了好几层高。豪华夸张的建筑风格

[1]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向世人展示,在这个城市兴建之初,它的土地是多么廉价啊,没有人会在意占地面积是多少。著名的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其他大洋行,都拥有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1]

九年后《纽约时报》干脆将外滩称为“远东最美的风景”,著文介绍说:“上海最主要的街道名为外滩,它距黄浦江约12.192米,与江岸平行。在外滩和黄浦江之间,是两排绿树和一片美丽的草地,它们总是保持得非常漂亮。”^[2]“外滩上的建筑美观辉煌,让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到无限的荣光。这个城市完全国际化了,她的街道呈现出世界上最独特的风景”。^[3]“离开外滩,向市中心走去,你会途经五花八门各式商铺。在一些店里,你几乎能买到所有的商品,从缝衣针到一只锚链。但走进租界,进入我们自己的城镇,你会发现,这里任何一个商店里,都能买到所有的东西,欧洲货或清国货一应俱全。租界的建筑,大多为洋人所有,这是他们在上海绝妙的投资,因为他们的国人只在租界居住,房地产市场兴旺发达。走过租界后,就到了跑马场。……远东最好的一条街道就从这里开始。整条街道不超过六英里,路面整洁、完美,街道两旁有漂亮的花园别墅。有些别墅,简直可以与美国罗得岛的新港相媲美。这条道路一直延伸到租界旁的徐家汇,再往前就变成清国狭窄的手推车道了。”^[4]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人们可看出上海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之路。

3. 城市人口的增加不仅扩大了实物商品市场,而且也拉动了服务业、娱乐业等非实物商品市场的发展。城市是多种非农经济活动的集中地,经济领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第二、第三产业向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187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以它特有的敏感发表《首家机器棉纺织厂在上海建立》一文,报道了官督商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设计划,称洋务派“他们已经得皇帝陛下的许可在大清国内创建一座纺织厂。……发起这项创建国内制造业计划的人断言,用本国出产的棉花来制造纺织物,其品质相当于或优于用国外进口的同类产品的品质。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所遵循的步骤是,建造一个由800台54织布机组成的纺织厂,聘请有经验的英国人管理工厂三年”。“投资者声称,由于运输费、保险费以及各种开支的节省,他们那60万美元的资金每年足以给他们带来超过30%的利润。……这种使得净利大大增长的成本降低额中的大部分,将会用来追加到员工们的工资表中去,原因是,投资者希望能拥有足够多的员工每年生产出10

[1]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万匹成品布,而按计划将付给员工们的工资总额每年才1万美元”。^[1]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开始建厂。十年后开始投产,生产棉布和棉纱,机器是从美国引进的,雇用工人约4000人。1893年12月,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上海的筹办和崛起,引起了美国企业家的不安,他们担心中国的同行早晚会夺走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在这一方面《纽约时报》充当了他们的喉舌。1886年8月7日该报发表《租界见闻》,认为:“实际上,大清国自己的制造业起步的那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将会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就不会再需要从我们这里进口任何东西了。”^[2]

《纽约时报》对上海服务行业的报道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的俱乐部显得十分的奢华、阔气,足以让从伦敦和纽约来的客人们羡慕不已。……上海盛情好客,无比慷慨,这里的主人真诚地想让每一个从远方来的客人心满意足。……今天的上海,从世界各地拥来了无数的观光客。酒店为他们敞开迎宾的大门,……这里有十几家服务层次不等的酒店。其中,以礼查饭店最受欢迎,其服务水准与它在纽约的姐妹店相差不远。”^[3]《纽约时报》对礼查饭店情有独钟,是因为这是由一个美国船长在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建造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酒店。它坐落于上海著名地标外白渡桥东侧,据历史档案记载,早在1867年该店就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各种生活设施齐全,是外国人旅沪下榻的首选之地。1917年英国伦敦出版的《今日远东中国内外印象·礼查饭店》也认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式的建筑——礼查饭店是中国最有声望的饭店之一,这不仅在远东,就是在世界大城市的旅馆中,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4]1877年12月底《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上海第三产业兴旺情景时说:“从前,外滩上的饭馆开席时,总会伴随着香槟塞子从瓶口喷射而出的脆响。据说,那时一个晚上积累下来的软木塞,就需要好几十名苦力用扫帚来扫除。……有大量尽情狂欢的活动在上海发生。”^[5]

当然,就上海而言城市化的轨迹是“以港兴商、以商兴市”,^[6]近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及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上。这点

[1]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4—5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 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 《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总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开埠初期的上海

与纽约十分相似。耳熟能详的第一艘运送美国商品前来中国的“中国皇后号”是纽约的商船，^[1]纽约“对于欧洲货物和人群来说，一直是其便利的集散地”^[2]。1860年纽约“全市经营全美三分之二进口业务及其三分之一出口贸易”。^[3]

1877年12月24日

《纽约时报》记者T.W.K《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中说：“上海坐落于黄浦江边，离那条著名的大河还有12英里。黄浦江水从吴淞口流入扬子江。……吴淞口一带，千帆云集，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耸立着，一个城镇就这样拔地而起。这里有清国唯一的一条铁路和电报线，连接着吴淞口和上海。”^[4]“上海静卧在黄浦江的河弯处，整个城市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新奥尔良，同样是水流湍急、浑浊不清的河流，同样是蜿蜒的河岸和岸边停泊着的汽船、驳船，而河中船上耸立的桅杆如森林般密集，江岸上也有一排排错落排列的储物仓库。江上，划艇和小帆船穿梭不停。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组特有的景象，也不全是新奥尔良的翻版。上海有更多的小划子和小帆船，前者是一种摇橹而行的小船，后者是一种平底的帆船。船头坐着的那些留长辫子的清国船员，也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船工们毫无相似之处”。^[5]

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赞叹：“这几年上海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以至于那些怀旧的人们可能很难再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各方面的成长，使这个城市矗立为远东第一商埠和东方的一颗明珠。”^[6]《纽约时报》向读者强调了上海港优越的地理位置：“顺江而下就是吴淞口，黄浦江从这里汇入扬子江。这里是东方最优越的港口。”^[7]“大型蒸汽轮船从上海溯江而上，最远可达汉口，也可顺江一直开到宁波。有一部分日本邮船是蒸汽轮船。十年前，这些船都悬

[1]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7]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挂星条旗,很容易让人触景生情,想起我们遥远的故乡”。^[1]

早在1877年《纽约时报》就已论定,与日本的港口相比,上海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商业大都”、“一个更早开埠的国际商业城市,商贸业也有更丰厚的利润”。^[2]这一点也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共识。1879年5月17日上海迎宾团主席李达礼在欢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将军的仪式致词中称,上海“在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最东边”,在这个“欧亚大陆最东部的商业中心,一条航线把新老两个世界联结到了一起”。^[3]

1886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明确指出:“近十年来,上海巨变,成为东方第一商埠”。^[4]“上海市场堪称完美,难怪许多人都会带着这种印象离开。目前,凡是这个城市及其周围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即使在1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5]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这一地位直到解放一直没有动摇过。1863年下半年,“从上海输出的棉花有36万担,价值200万英镑以上”。^[6]1877年底《纽约时报》写道,“在过去数年里,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已大幅下降,……去年上海的进口贸易总额为4700万两白银,价值6000多万美元。如果不把银币计算在内,美国在其中约占100万美元的份额”。^[7]1909年6月4日该报刊登的《对美贸易出口1055万美元》一文又说:“从上海输往美国的茶叶贸易价值近200万美元,生丝超过500万美元”。“邻近上海的乡农们大约在6月1日收集蚕茧,生丝会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港口,出口到其他国家。下半年的工作量最大。1908年从上海出口到美国的生丝总价达到5250216美元,其中86%是下半年运出的。……1908年,从上海港运往美国货物总价值为10545423美元。其中,第一季度成交额为1029070美元,第二季度为819203美元,第三季度为4034603美元,第四季度为4662547美元”。^[8]因此20世纪初的上海市场早已不是地方小市场、一般的城市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乃至

[1]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 《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3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格兰特将军访问广州、上海记》(1879年6月2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2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5]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6] 《北华捷报》1864年1月9日。

[7] 《火轮信使——一个美国人的游记》(1877年12月24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4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8]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8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世界性的市场。

与其他国际港口贸易城市一样,上海当地的内外贸易导致了为其提供资金调济和融通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在金融服务方面,自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外滩率先设立后,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接踵而至。90年代又有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相继设立。1902年总行设在纽约的花旗银行在外滩设上海分行,作为美国政府委派的驻中国的国库代理机构,经理中国的赔款。到20世纪30年代外滩银行林立,成为“东方的华尔街”。

4. 城市是集聚了大量的非农从业人员,是财富、享乐和欲望的集中地。城市化进程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是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普及。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租界见闻》,心满意足地声称:“洋人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舒适,……这里是家庭主妇充分获得休息的庇护所。……你可以充分地使用仆人,一旦这些仆人们闯入了你的生活,一切就会像上了发条的时钟一样,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仆人们忠诚可靠。你告诉他们去做一件事,就可以确信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好。”^[1]

在城市生活设施方面,1872年上海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时称“沙漏水行”。1875年洋商在杨树浦建成一座占地115亩的自来水厂。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英租界连续供水,1882年该公司又在法租界铺设管道,向法租界供应自来水。这些举措引起了《纽约时报》的高度赞扬,1886年该报发表文章,认为供水是城市的一个大问题,通常这是东方城市的致命弱点。在远东地区,由于饮用不清洁水而死亡的人数要比其他所有原因致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大。“令人惊奇的是,上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一个了不起的供水系统,居民提供优质饮用水”。^[2]

在市政建设方面,《纽约时报》充分肯定了上海的排水系统、照明系统和消防系统,说:“黄浦江的潮高约为6英尺。可以想像,要在一个地势如此低而平坦的大城市修建一个通畅的排水系统,会是一个多么艰巨而庞大的工程。然而,这个排水系统已经建成了,而且看起来运转得相当令人满意”。^[3]“城市的主要市区用电照明,而郊区道路上使用汽灯。上海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消防部门,配备

[1]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了救火机。^[1]街道以碎石铺成,显得井然有序”。^[2]

在社会治安方面,“上海警队的组织相当完善,警力充足”。个人财产“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人们没有失窃和失火之苦,居民们可以在路况极好的街道上舒适地行走”。撰稿人笔锋一转,反问道:“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中,又有多少可以吹嘘做到了这些呢?我想没有。”^[3]

如果对照当时的纽约,这位撰稿人并没有夸大其词。在19世纪一十年代的纽约,“尽管治安条例很好,但从未付诸实施,死掉的猫和狗随处可见,致使空气奇臭难闻;积尘和烟灰都被扔到街上,这些街道在夏天两星期才清扫一次,而最大、最拥挤的街道要一个月才清扫一次。……纽约的饮用水很糟且带有咸味。即使是所谓的曼哈顿水……也说不上好。肮脏的环境加上糟糕的水质致使在纽约疾病的蔓延如同赚钱一般猖獗”。^[4]直到1845年“马继续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猪仍然在街上搜寻食物;被赶往屠宰场的牛留下的一堆堆粪便,致使已十分肮脏的街道更是臭气熏天”。^[5]1835年、1845年和1858年纽约发生了三次大火灾。1835年的大火一直延续了三天三夜,“无疑是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全部损失据估计达1800万至2000万美元”。“1845年的一次大火共烧了五天五夜,1858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市政大厅的一部分”。^[6]

从1850年到1862年,洋人在上海出资购地,连续建设跑马场,最后定点在静安寺路以南、西藏路以西,人称跑马厅。每年5月、11月,西人各进行一次赛马活动。《纽约时报》对此也有明确的报道。1886年8月7日发表的《租界见闻》介绍说,上海“跑马场每年举办两届赛事”。^[7]此外还有运动场和球场。《纽约时报》认为上海在文化娱乐、个人休闲和社交方面堪称一流。“外滩上,建有公共花园。在仲夏夜的黄昏,有乐队在这里演奏,女士和孩子们聚集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到那里去,有些女士还定期光顾。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让居住在这个东方城市的人们无不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外滩)这边,有一位洋行大班(商行的老板)带着家人,正朝一个很时髦的街道走去。即使在伦敦或纽约,你也很少见到这样富贵气派的排场”。^[8]

[1] 1866年1月7日,工部局成立主管消防的火政处,1869年法租界消防队加入公共租界的火政处。

[2]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 《租界见闻》(1886年8月7日),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4]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美]乔治·J·兰克维奇著,辛亨复译:《纽约简史》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8]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修订本)第6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